

热历史

古时多暑热

□户力平

北方主晴热 暑热难耐皆赤日

元代以前,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高温天气的记载极少,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详细起来。《明实录》中便有北京暑期高温的记载:正统三年(1438年),“六月丁丑,雨泽愆期,苗稼枯槁(gǎo),有缺群黎秋成之望。”“炎暑炽热,都城门外少见路人,(护城)河水减半,草木遍黄,无以生机。”成化十六年,“时至四庚之日(二伏),暑热难耐,燕地皆赤日,顺天府各县均有病渴者,唯大兴、宛平居多,毙命者百余人。”“酷热已半月有余,炎日气(温)高,(北京)城中车稀人疏,多有渴者沿街而卧。”万历二十八年,京畿“久旱酷热,诸谷焦枯,疫病流行。”万历四十三年,大学士方从哲上言:“日者,天时亢旱,雨泽稀微,赤日流金,土焦泉涸,都城内外,疫癘盛行。”

清代北京也出现过数次伏暑高温天气。康熙十七年“六月壬午:今日值盛夏,天气亢阳,雨泽维艰,炎夏特甚,禾苗重蒿(hāo),农事甚忧,六月炎暑,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。”乾隆八年六月“京师盛暑”。六月初一日,乾隆帝谕:“近日京师天气炎蒸,虽有雨泽并未沾足,若再数日不雨,恐禾苗有损,且人民病渴者多,朕心深为忧惕。”道光七年六月癸未,道光帝谕:“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,酷热非常,又形酷暑。”同年夏,“昌平大热,人有渴死者。”光绪三年六月初八日,北京天气“曠(hàn)干可虑,毒热不可当。”由此可见,明清时期北京的高温天气应不低于40℃,才会出现“暑热难耐,燕地皆赤日”的现象。

明清时不仅北京地区出现高温天气,周边顺天府所辖各州县均有出现高温的情况。据《霸州志》载:明万历四十三年“州城恒燠,河湖皆枯,百草不繁。流民行于京师,渴死途中者居多。”《宣化志》记载,乾隆八年“夏暑热,有渴死者。禾枯如柴,民不得生。”《保定府志》有:乾隆八年“天气亢旱,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



▲清代绢底书画纨扇 运城博物馆藏 记者 刘亚 摄

月初五日,人多渴死。”

有气象学家分析:北方高温天气,大部分以晴热天气为主,太阳辐射增强,蒸发作用加大,导致近地面大气明显增温,呈现炎热或闷热,易致人中暑,严重时会导致死亡。乾隆八年,顺天府各州县上奏,因高温炎热而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一万人。为此,乾隆皇帝传旨,先是向所有灾民发放一个月口粮,初为“普赈”,随后又进行了“大赈”与“加赈”,总共算下来,近两百万灾民中,最多的可获得半年多的口粮。

南方似蒸炉 温湿蒸炎闷杀人

历史上,我国南方地区也出现过多个年份的高温天气,远在唐宋时代时期便出现过。据《中国气象灾害史话》载:《旧唐书·宣宗本纪上》有开元二十四年“大热,道路有渴死”之记载。宋至道二年,“六月,大热,民有渴死者”。景德元年四月丁卯“隆暑”,六月壬午“人多渴死”。嘉定八年,今安徽、江苏、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。《宋史·天文五行志》云“五月大燠,草木枯槁,百泉皆竭。”旱热程度甚至达到“行都斛水百钱,江淮杯水数十钱”的地步。

宋代的高温天气,令诗人们赋

诗感叹。北宋诗人孔武仲《伏中作二首》云:“酷暑已旬日,熏炙势自如”。陈造《立秋日》曰:“酷暑如酷吏,顷刻不可对”。

宋代金石学家、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六月,冒着酷暑奔赴建康(今南京)觐见宋高宗。当时高温肆虐,其赶路心急,防暑不及,患疟疾病,卒于都城,年仅49岁。

明嘉靖九年,南京再次发生“热灾”,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酷热难耐,遂赋《苦热》诗:“南京六月梅雨积,温湿蒸炎闷杀人。衣冠出门苦流汗,簿书堆案兼劳神。”有史料记载,当时被“渴死者”不下千人,以致棺槨制作不及。

南京,一直以来被称为南方“三大火炉”之一,而另两座与之齐名的“火炉城市”是重庆、武汉。

“火炉城市”这个说法最早反映的是人们的直观感受,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。如今,“火炉城市”的衡量标准已明确为炎热指数、高温日数、连续高温日数、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诸多因素。以出现35℃以上高温日的数量多少来衡量,南京、重庆、武汉每年的高温日居于南方诸城榜前列。按照有关资料显示,这三大“火炉城市”夏季35℃以上高温天气,平均每年19.3天,37℃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4.5天。另有数据显示,“三大火炉”年平均暑热日数48天至68天,炎热日数17天至34天,酷热日数也有3天至14天之多。

“火炉城市”自古以来便饱受高温困扰,与其所在地区的地理风貌有直接关系。“山城”重庆之热源于地形,“渝炉”堪称“老山炼丹”,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,每年气温升至40℃以上的天气并不少见。而另两座城市之酷暑,竟与水系相关。“江城”武汉可称“一代炉魁”,此地江河湖泊众多,水汽大量蒸发,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,夏日闷热难耐。而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,水面广阔,夏日空气中湿度大,闷热异常,因湿热温度高,且持续时间长,故居“三大火炉”之首。 《北京晚报》

生活史

古人之睡诀



▲运城博物馆《本草撝华 中医药文化器具展》唐三彩瓷枕 记者 刘亚 摄

□傅维康

明代敦英《东谷赘言》说,多食之人有“五患”,其中之一就是“扰睡眠”。因此中国历代文献屡屡劝告:晚餐不可太迟过饱,睡前不可饮浓茶、喝烈酒。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说香茗“煎服令人不能眠”。

为了能安眠,古人提倡就寝前应适当散步和热水洗脚。清代《养生随笔》主张睡前“绕室行千步,始就枕”,如此则可从动中求静,有助于人睡和安眠。热水洗脚则既使分布于脚底某些具有镇静、安眠作用的穴位(如涌泉、失眠、内太冲等),获得良性刺激,又可减少脑部充血,帮助安眠。苏东坡的“主人劝我洗足眠,倒床不复闻钟鼓”诗句,正是他的真切体验。

古人深刻地认识到,卧具、卧姿、精神活动等都会影响睡眠。枕头的高低与软硬应适当,《养生随笔》引前人的经验说:“(枕)酌高下尺寸,令侧卧恰与肩平,即仰卧亦觉安适。”至于卧姿,孔夫子主张“寝不尸”,即不宜仰卧,而应侧卧。唐代孙思邈说“屈膝侧卧,益人气力,胜正偃卧”。躺到床上后,孔夫子劝导“寝不语”,不宜滔滔不绝谈话,避免脑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而导致失眠。宋代蔡季通也在《睡诀》中言简意赅地写到:“睡侧而屈,觉正而伸,早晚以时,先睡心,后睡眠。”为避免失眠,古人特别强调就寝前应使脑子放松、情绪平和的重要意义,明代庄元臣《叔苴子·内篇》指出:“心不求睡者,不得睡;心求睡者,亦不得睡;唯忘睡者,睡斯美矣。”即是说,睡到床上时,脑子不要老是想着睡眠这件事,而是听其自然,如此则易于人睡,且睡得沉稳。 《《中医药文化》杂志

史海钩沉

孙臆与《孙臆兵法》

□胡建新

孙臆是战国中期齐国人,早年曾与庞涓同习兵法,后来庞涓在魏国当将军,因嫉妒孙臆才高而将其骗至魏国,然后捏造罪名加以诬陷,并施以膑刑(去掉膝盖骨),孙臆由此得名。

公元前354年,魏国派庞涓率兵8万,由大梁(今河南开封)出发,北上进攻赵国都城邯郸。赵国无力御敌,遂向齐国求援。齐威王命田忌为主将、孙臆为军师,率兵8万救援赵国。战事伊始,孙臆便向田忌提出“围魏救赵”“批亢捣虚”等计策,趁魏国都城防空虚直捣大梁。庞涓见大梁危急,便急速回兵,途经桂陵时遭遇齐军截击,大败而归。此后,魏国又出兵攻打韩国,韩国向齐国求救,孙臆又与田忌一起抗魏救韩。面对庞涓的10万大军,孙臆使出“增兵减灶”之计,第一天挖灶10万,第二天减到5万,第三天再减至3万,自傲轻敌的庞涓误以为齐军伤亡惨重,于是丢下步兵,只带少量精锐尾追齐军,结果进入齐军设伏圈惨败而终,庞涓羞愧自刎。从此,魏国一蹶不振,孙臆却因其指挥卓越而名扬天下。

孙臆与田忌堪称唇齿相依、唇亡齿寒,田忌因遭大臣邹忌陷害而流亡楚国22年,直至邹忌和齐威王死后,齐宣王才召其回国,并任职做官。相传,孙臆也随同田忌回到齐国,但此时孙臆年事已高,且早已厌倦齐国的政治生活,再也无心做官,便归隐于莒县甲子山一带,以讲学和著述终其天年,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不朽的《孙臆兵法》。

《孙臆兵法》原书早已失传,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《孙臆兵法》竹简残本,经过精心整理,分为上下两编,共30篇,约11000余字。《孙臆兵法》是以具体的动作性数字式叙事为篇名,如擒庞涓、见威王、威王问、陈忌问垒、月战、杀士、延气、十阵、十问、五名五恭、五度九夺等等,可谓独具风格、饶有趣味。 《《今晚报》

文史拾零

古诗咏麦

较早的小麦诗歌,除了先秦的“青青小麦”“芄芃其麦”外,当属汉代的《古歌·高田种小麦》,只是作者无从查考,姑且叫无名氏。诗的全文是:“高田种小麦,终久不成穗。男儿在他乡,焉得不憔悴。”在那高高的田土上播种小麦,毕竟难以长出麦穗。虽然作者表达的是一种离愁别绪,但用小麦不宜种在高田比拟常人不宜住在他乡,于那久远的时代,倒也贴切。

唐代白居易的代表作《观刈麦》,一开始就以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”的诗句,表现农事繁忙和丰收景象。覆盖田垄的小麦成熟发黄,割麦者和拾麦者的情形跃然诗中,而昨日的割麦者成了今日的拾麦者,缘自繁重赋税失掉田地,今日的割麦者也可能成为明日的无田人,沦落到拾麦充饥的地步。作者时年36岁,官至县尉,联想自己“曾不事农桑”,却

拿着“三百石”俸禄,一年将尽时还有余粮,故而“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”,这种爱民察民之情,历来为后人称道。

诗人面对大地上的麦子,怎能不引发诗兴!因而留下许多以麦为题的吟麦诗。仅《种麦》同题诗,其诗句,陆游有“垦地播宿麦,饭牛临野池”;刘敞有“禹稷躬稼穡,春秋重麦禾”。

古诗亦涉及过麦价。如李昭玘的“明年麦价应如土,安用登高把酒杯”;陈著的“麦甑凄凉稻尚青,粒珠乘急价掀腾”;俞德邻的“尔时石秫十二千,仍更五千余石麦”;王世贞的“休汝毋言计尽非,麦田虽薄价还微”。而章甫在《田

家苦》中写到一位“问路”的粮商,粮商听说粮农的苦楚:“今年麦熟胜去年,贱价还人如粪土”,意即今年麦的年成胜过去年,但价钱便宜,用贱价的小麦偿还以前的债务,很不值钱。最后一句“农商苦乐元不同,淮南不熟贩江东”,说的是粮商的苦乐与粮农不同,受天气的影响不大,一旦淮南歉收,粮商可到江东贩运,以求低价粮源。到了清代,乾隆的《割麦行》,结尾说到“幸兹割麦逢饱秋,持鬻却苦价太贱”!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“谷贱伤农”的同情。

《《粮油市场报》》



▲稷益庙壁画中的麦收场景 记者 刘亚 摄